

作为“中间体”的南宋皇城遗址：媒介学 视野下地方复现与遗产传承

董卫民

摘要：“时空压缩”语境下，地方复现代表着现代人对稳定与安全的向往，和对“不确定性”的反抗；而城市遗产作为城市空间构成的重要成分，维系着稳定的地域文化认同，在城市地方确认中，有着明确的“边界”意义。媒介地理学强调媒介根深蒂固的“地方性”；德布雷的媒介学理论则突出媒介以“中间体”的“中介行为”承载象征意义、建构不同时代的文明特质、参与“地方性”塑造的物质属性。本文以媒介地理学理论为依据，结合德布雷媒介思想相关表述，考察南宋皇城遗址作为“中间体”的媒介内涵、作为城市遗产的媒介可见性，及其在地方复现与遗产传承中的数字移动化传播转向，为新技术时代城市遗产传播和地方认同的媒介化延伸及文旅发展提供新的思考角度。

关键词：城市遗产；地方；中间体；可见性；数字媒介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21)05-0149-08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1.05.013

一、引言

随着城市化推进，城市人口高速增长、交通工具日渐完善、物资和信息流通不断膨胀，在日新月异的传播技术加持下，城市生活也在城市功能延伸中走向繁复。这样的背景下，城市遗产作为城市记忆和文明传承的载体，其保护与开发就成为备受瞩目的社会热点、难点，事涉城市遗产往往会引发较高的舆情反应。作为最具本土特色和历史气息的物理空间或物质实体，城市遗产开发、保护，及相关文旅产业发展也极其复杂。在全球化、城市化和媒介化交织的现代社会，由城市遗产引发的社会关注，隐含着都市人对稳定的向往与对失去“地方”的找寻。

“与空间相比，地方是一个使已确立的价值观沉淀下来的中心。人类既需要空间，又需要地方。人类的生活是在安稳与冒险之间和依恋与自由之间的辩证运动。”^{[1](P44)}而“地方”成立的重要标示之一就是城市遗产，城市遗产既包括带有艺术、科学价值的历史建筑、街区，还包括延伸于其中的生活规范和文化仪式。因此，城市遗产作为城市空间构成的重要部分，既以历史建筑、街区等形成城市悠久历史的具体物象，又以独特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仪式象征着城市丰厚的文明积淀，代表着独特的城市价值，维系着稳定的地域文化认同，在城市地方的确认与发展中有着明确的“边界”意义与现实功用。

基金项目：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想象杭州与本土再现：媒介地理学视角下南宋皇城遗址研究”(Z20JC054)

作者简介：董卫民，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主任编辑，dwm627@163.com(浙江 杭州 310018)

媒介地理学作为文化地理学延伸，其理论依据是“文化利用地理使特定空间被赋予特定意义”^{[2](P40)}。作为媒介地理学基本构成要素，空间、时间、地方、景观等分别具有不同的媒介属性，且彼此勾连。空间（Space）“为媒介传播环境中的材料与景观”，“不只是自然的、地理的一般性存在，还是社会和媒介的复杂性建构”^{[3](P53)}。时间（Time）作为媒介地理系统变化和流动表征，正在被大众媒介所改变^[4]。地方（Place）与社会意义和空间建构紧密相联，“地方”赋予媒介根深蒂固的“地方性”。景观（Landscape）在媒介地理学中是“媒介对世界的描述和解释”，“不断地塑造和建构景观社会”^{[3](P130)}。可以看出，时间、空间、景观等都极具“物质”属性，体现了近年来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物质性转向”，“强调传播对于推动社会系统运行与促进社会结构流动的潜在作用”^[5]。媒介研究开始从“重精神、轻物质”转向“从定义广泛的‘物’的视角切入关注媒介传播的基础设施、技术系统、实践过程等，留意符号、思想之外的物质属性”^[6]。

法国思想家雷吉斯·德布雷的媒介学理论整合技术、文化与历史多重视域，重点关注“一个观念通过哪些媒介化成为一种力量？一个话语如何能造成事件？一个精神如何能获得实体？”^{[7](P92)}其目的是“考察信息传递中高社会功能（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和思想态度）和技术结构的关系，思考媒介如何运载信息”^[8]。在德布雷这里，媒介（Medio）“是指媒介行为，也就是媒介方法的动态整体和介于符号生产与事件生产之间的中间体”^{[9](P17)}。德布雷把媒介学看作是通过思想运行的“物流方式”^{[10](P3)}，媒介在德布雷这里就是以物质承载象征意义，形成文明传承的中间过程与中间体。媒介地理学中的“地方”以其“空间”、“景观”质料，在时间的自然流淌中沉淀为“地方性”的物理实体和精神内涵，与德布雷的媒介“中间体”思想内涵巧妙“勾连”。

本文以媒介地理学理论为依据，结合德布雷媒介“中间体”相关表述，考察南宋皇城遗址作为城市文化“中间体”媒介和皇城文明“纪念物”在地方复现与城市遗产传承中的媒介化本质，和产业价值实现的数字化传播转向。试图从学术视角探讨如下问题：南宋皇城遗址在杭州乃至江南地方的文化建构中，其“中间体”媒介特性是什么及如何体现？其作为“中间体”的地方性何以“可见”？皇城文化的数字移动化传播如何可能？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为新技术语境下城市遗产传承与地方认同的媒介化延伸及文旅发展提供新的思考角度。

二、媒介作为文明传承“中间体”

在媒介地理学这里，媒介或维系、或消解着“地方感”，但消解与维系的最终指向，都是对“地方”的塑造或复现。德布雷认为，媒介的重点是“中介行为”，它“包含在一定的社会时期内所有的惰性载体和活性载体，这些载体对推动或促进象征符号的传承起着必要的作用”^{[7](P130)}。媒介在德布雷这里被理解为联系特定场景或到达特定目的中间过程或物质载体，借助这些载体及其“逐渐扮演的集体记忆和社会档案的重要角色，整体意义上的物质性载体和符号手段担保每个时代的社会存在”^[8]。与传播（Communication）研究在同一时空中交换信息的规范意涵不同，媒介学的关键词是“传递”（Transmission），其兴趣在于考察时间向度上精神转化为物质的过程中媒介的功能性作用，德布雷将这种作用视为精神传递的先决条件：“为精神配备一个传递装置。”^{[7](P126)}这个“装置”是具有历史向度的媒介，它以历史“中间体”的“中介行为”和其自身一起建构不同时代的文明特质，形成人类文化生生不息的“河流”，参与“地方”的物理空间与精神道场建构。

（一）作为“中间体”的南宋皇城遗址

南宋皇城遗址坐落在杭州西湖南端凤凰山麓，沿万松岭路进入凤凰山脚路，即可到达原皇城正门——丽正门。作为皇城文化的一个缩影，南宋皇城遗址与秦之阿房宫，汉之未央、长乐、建章三宫，唐之大明宫比较，规模要小很多，原因“一是南宋统治者始终称杭州为‘行在’而不称京城，

表明他们打算在收复中原失地以后，仍旧要还都汴京”；“二是因为高宗赵构从北宋灭亡中吸取了教训，知道不能滥用民力，否则就会重蹈覆辙”^[11]。不过，南宋皇宫大内虽然当年出现过“一殿多用、随事易名”之举，但作为皇城宫室，它仍然“五脏俱全”，由南内、北内、太庙、景灵宫等组成；而且和其他王朝的皇城相比，它真山真水，具有完整的山系、水系、御园景观和礼制体系，在中国皇城文化中非常独特。

遗址区内多为山地，遗址上现在建有馒头山社区，民居高低错落，没有太多生活设施，保持着几十年前的形态。除了社区外部街道进行基础性整治外，遗址区内比较凌乱，地面现存遗迹不多。遗址区内的国家重点保护文物——梵天寺石经幢，经过风吹雨蚀，已经破损不堪，目前添加围栏做了保护；“大内”西部山间，圣果寺遗址和雕刻于五代后梁开平四年（910年）的三尊佛像尚有残存遗迹，山体石壁间宋人刻写的“忠实”“凤山”等字迹尚存；“禁苑”内的“月岩”“通明洞”等景点已经得到文物管理部门修缮，其他能够流连盘桓的地面遗迹极少。1995年发掘考古出的南宋太庙遗址，作为“迄今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好的皇室太庙遗址”^[12]，除几墩台基外，也仅仅象征性作了一块保护绿地。

但是作为城市遗产，南宋皇城遗址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资源的物质载体，携带着特定历史空间的文化记忆绵延至今。它们在残存的历史遗迹和建筑中以建筑材料、建筑形状等材质上的图文雕饰等符号，以及周边山水间留存的摩崖石刻、文字痕迹等形式存在。南宋皇城遗址是一些既有具体物理载体的实体存在物，又有价值内涵的文化象征符；加之在皇城遗址区域内数百年来形成的日常生活习俗、交流规则及节庆仪式等，共同组成了物质载体、象征载体和交流规制交织在一起的文化轨迹，并在代际传播中不断被强化、修正、延伸，成为地方的精神纽带和边界标示，最终形成城市遗产，建构起地方的可见性，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完成“人-地”情感维系和文化凝结，其作为具有显著“中介作用”的媒介“中间体”是显而易见的。

（二）南宋皇城遗址的媒介特性

在德布雷看来，媒介学与人类相伴而生，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在于人能在不同历史空间内与时间交流沟通，形成文化的延续；这种延续靠的就是具有记忆、传承功能的媒介——“中间体”，即“在特定技术和社会条件下，象征传递和流通的手段的集合”^{[10](P4)}。这种集合包含了具体的媒介载体、符号，以及传播设备与媒介组织规制等，属于历史范畴的传承，“它是以技术性能为出发点（通过媒介载体的使用）。一方面，将这里和那里连接起来，形成网络（也就是社会）；另一方面，将以前的和现在的连接起来，形成延续性（也就是说文化的延续性）”^{[7](P5)}。因此，传承是一个互动过程，是“技术与文化互动”^{[9](P12)}的媒介行为。南宋皇城遗址作为“中间体”媒介，所传承的不仅是其前、其后数千年来帝都皇城文明，也是迄今在遗址区域绵延的“地方”文明——是“相互联系、具有认同感的结构”^{[7](P13)}。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媒介地理学中根深蒂固的“地方性”，也具备德布雷的“中间体”媒介属性和特征。

因为遗址主体埋藏地下，且经历元、明、清改朝换代的战火，南宋皇城地面遗迹已荡然无存，其作为“中间体”媒介有着独特的地理特征，其媒介特性首先就体现为非连续性：南宋皇城上承钱氏吴越国，亡于蒙元后即遭大肆焚烧，它既没有西安、开封皇城的延续性，更没有北京皇城历元、明、清三世的连贯性，因此作为“中间体”媒介，它最显著的特性就是非连续性。其次是艺术图像性：南宋皇城文化及其遗址文明除了留存于《梦梁录》《武林旧事》等书写文本外，多以视觉图像形式留存于宋画中，具有鲜明的艺术图像性。与此相关，它的另一个媒介特性就是不可复制性，现在借助宋画“复原”的宫阙、建筑只能称之为“想象图”。南宋皇城遗址的第四个媒介特性是融合性：从现存宋画图像和相关笔记记载看，南宋皇家文化与市井文化融合程度非常高，这和南宋经济、艺术高度发展密切相关。在今天的十五奎巷、御街及太庙遗址等空间内，这种融合性已经物化

为独特的习俗规制和文化仪式。而南宋皇城遗址作为“中间体”媒介的上述诸多特性如今或现或隐融进南宋皇城文化“媒介丛”中,构建了独特的城市遗产。

三、“可见”城市遗产的媒介丛

斯宾格勒认为,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城镇文化^{[13](P79)}。遗产是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城市遗产首先表现为最具本土特色和历史遗痕的空间,其次是在这个空间里流淌的文明记忆、交流规范和文化仪式。它既是物质实体与符号的交融,是非历史的空间建构需求与历史逻辑的对话;也是全球化、技术化造成的“时空压缩”背景下,现代人安放心灵、寻求归宿的“地方”。作为传承文明的“中间体”媒介,城市遗产像语言逻辑出现之前的骨骼、化石、洞穴岩画等可以穿越历史的物体材质一样成为记忆媒介,是以物理质料或符号表征着人类过往记忆的纪念物,具有产生地方、使其延续、形成团体^{[7](P28)}的功用。它们在空间层面上成为联结同代人的组织规范;在时间层面上则成为代际延续的文明传承。因为有城市遗产这个载体的存在,地方在历史延伸中也就具有了“可见”的边界。所谓“可见”,就是依靠“提供关于情绪、感受和功能性生活规律能够感受到的形式”^{[1](P137)},即媒介。但是“任何一种媒介只有在与其它媒介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意义和存在”^{[14](P40)}。因此,一个地方的记忆媒介实质上是一个“媒介丛”,即德布雷所说的“设备-载体-方法系统”^{[9](P13)},是多重媒介构成的“媒介丛林”。南宋皇城遗址城市遗产就存在于宋画、遗址废墟、日常习俗等可见的“媒介丛”中,这些“形式”不仅具有物质实体性,更具有符号性、仪式性。

(一) 宋画:理想图像的视觉依据

城市遗产除了历史建筑,还有图像、文学戏剧以及日常饮食、传统仪式、习俗等都是“可见”形式;这些形式共同完成对地方的物理呈现和精神界定,比如图像作为可视化记忆媒介,就是城市遗产理想的视觉载体和复现依据。

南宋皇城遗址作为文明传承的“中间体”,其纪念物属性最早是通过具有浓厚象征性色彩的图像——宋画予以表征的。关于这个方面的研究,目前已经形成的成果如学者傅百星的《宋画中的南宋建筑》《图说宋人服饰》等比较典型;它们通过对宋画中的建筑图像、人物服饰考证,追索当年皇城文化的历史细节。如前文所述,南宋皇城遗址元初被毁,后历经元末张士诚之乱、晚清洪杨之役,这里早已成为废墟,致使后人无法像研究西湖、大运河一样通过西方传教士等人留下的近代摄影图像研究南宋皇城遗址,宋画就成为当下研究南宋皇城文化可以参照的主要图像资料,比如:宋人马和之的《孝经图》,李嵩的《高阁焚香图》《水殿招凉图》,赵伯驹的《宫苑图》,马远的《楼台春望图》,以及佚名画家的《悬圃春深图》《宫中行乐图》,刘松年的《宫女图》《文会图》,等等^{[15](P22-66)}。其中有关于南宋皇城宫阙建筑、宫人服饰、市井俚俗等精致的视觉表达。宋画作为南宋皇城遗址“地方复现”的视觉依据和理想图像,在当下南宋皇城遗址发掘和文旅产业开发中的媒介价值不容低估。

(二) 遗址废墟:可见的物理空间实体

如文学艺术品能够引发人们对一个地方的情感投注和空间想象一样,作为记忆媒介的城市遗址、建筑废墟亦是代表性的地方可见性标示物,甚或是一件雕塑、一片摩崖石刻或时人的题书等对抗时间流逝的物化质料,都可以成为延续地方认同感的媒介纪念物。

虽然目前在南宋皇城遗址内地面遗址非常有限,仅存的梵天寺石经幢也是吴越国时期建造的梵天寺历南宋而至元末被毁后的留存遗物;其他如遗址区内残存的皇城城墙、南内、德寿宫、景灵宫、恭圣仁烈皇后宅等废墟尚有依稀景观遗存物。那些属于皇室私苑的御园建筑遗址或废墟多散落在玉皇山西北部和西湖孤山等处,目前已经规模化发掘“复原”的如南宋官窑遗址和八卦田作为皇

城遗址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具备了“建筑遗址”的样态，不仅具有观赏价值，也成为杭州作为古都皇城的“地方”标志物。这些遗址废墟作为记忆媒介，在绵延的时间河流中已超越其最初表达皇室情趣、礼佛悟道的一般意义，成为文明承续和代际记忆的意义集合体，具有特殊的“地方”价值。

（三）习俗和礼制仪式：文明的“地方识别物”

作为延续皇城文明的“中间体”媒介，南宋皇城遗址的地方可见性另一个体现是日常习俗和礼制仪式，皇城文化已经融入区域内岁时节日、服饰饮食、歌舞戏曲等日常经验和交流规范、区域组织中。当下能够反映这种日常习俗的物理空间有三个：一个是遗址上的馒头山社区，一个是商业开发的南宋御街（含河坊街），还有一个是和御街相连的十五奎巷（含太庙遗址）；而其流播演进的呈现也被记录进历代文人笔记、小说、戏曲话本，如：宋末周密的《武林旧事》，吴自牧的《梦粱录》，明代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张岱的《陶庵梦忆》以及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它们中都有南宋皇城遗风的相关记述，诸如纳凉、赏花、七夕、出游、南内宵夜等，这些已经融入今天杭州人的日常生活。

能直接体现杭州皇城地方属性的可见性媒介，当属比较完整的南宋礼制文化。其“完整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皇家礼制线路完整，长约十余里，“是由皇家御道串联重要的南宋皇城功能遗址。如八卦田遗址、郊坛下官窑遗址、皇宫皇城遗址、三省六部遗址、太庙遗址、朝天门遗址、德寿宫遗址、御街遗址等等”^[16]。其次是礼制体系完整，该体系由太庙、太社、太稷坛、郊丘、崇禋馆、耤田先农坛、海神坛等组成。三是皇家礼制文化的物理载体，如前文提到的南宋太庙遗址。这些南宋皇城礼制文化和仪式的发掘与复现，是杭州作为中国古都之一的重要“地方识别物”。

综上所述，南宋皇城遗址以图像、遗址废墟和文化礼制的“媒介丛”形式，形成地方的“精神气质”。这些遗址废墟、宋画、礼制等媒介的留存与互证，不是叠加而是文明延伸的物质依据。根据媒介地理学观点，随着技术与文明发展的同步，“新型的‘媒介地理’促使现实边界模糊化、空间压缩化和人际分离化”^{[17](P019)}。德布雷媒介学理论在考察技术与文化互动时，也明确提出“文化将人类物种分割成具有人性化的却不相叠加的东西：种族、人民和文明。然而，技术又将人类整合成一体，使我们的知识技术变得同质化。地点的记忆就是民族中心主义的一个因素”^{[10](P56)}。所谓“地点的记忆”，即地方的回望。地方作为个人或族群对土地的身体经验和情感依附，代表着稳定与安全，是对变迁不居和技术同质化的对抗，作为媒介的纪念物，城墙、废墟、寺庙、经幢、宫阙等城市遗产无声地叙述着历史的永在，默默对抗着“现实边界模糊化、空间压缩化和人际分离化”。那么，作为文明中间体的城市遗产，南宋皇城遗址在当下的“遗产热”中如何实现文明传承和地方复现呢？数字移动媒介为它提供了契机。

四、数字移动媒介与地方复现

在城市化不可抗拒的“宿命”中，城市遗产保护往往被解读为“稳定不变的地方与媒介技术及其所带来的变动世界的对立”^[6]。这样的解读固然可以讨论，但城市遗产作为稳固的地方记忆——尤其是作为纪念物存在的遗址，却和它的物理质料一样是真实“可见”的。从媒介地理学视角探讨如何在“想象杭州”与本土再现中做好南宋皇城遗址的保护和开发，首先就是在遗产的文化在地性和物理在地性上做好“地方复现”。

基于对媒介物质性的高度重视，德布雷根据其媒介圈演进理论将人类文明归纳为“话语圈”“图文圈”“视频圈”^{[7](P46-47)}等依据技术革命依次出现的变迁。三个媒介圈分别对应语言文字、印刷术和电子视听图像等，形成载体各异的媒介生态，具有各自的主导媒介和记忆技术；而且德布雷据此认为，人类文明演进中信息流动地理扩张存在加速趋势，而这种加速度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文明传承危机，因为“技术联结越来越强，象征性联结却越来越弱”^{[7](P8)}。所谓“象征性联结”即意

义和意识形态的联结；意义联结弱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媒介的“非物质化”趋向加剧，即主导媒介作为痕迹载体的弱化，“基础物质的持续减轻”^{[10](P241)}。主导媒介的非物质化最终导致文明传承的移动性替代在地性、即时性取代历史性、符号性取代象征性，媒介背后的历史深度和地方价值也屈从于图像及视频的“实时”扩张。那么，在这样的媒介生态延伸趋势下，数字移动媒介作为“视频圈”之后新的主导媒介，它在城市遗产保护中如何推动地方复现呢？

（一）切入手段：“人-遗址-机”互嵌

借助新兴科技进行文化遗产保护不断被探索，比如以数字虚拟技术还原场景，比较成功的如圆明园遗址数字化复原、数字故宫、数字敦煌等。但是依据数字虚拟技术对遗址或文物“复原”，实质上是对遗产的符号和视觉呈现，包装与衍生的图像无法替代遗产背后的族群文化、集体仪式，可被复制呈现的“场景”或物品也无法复现遗址或地方的精神“光晕”^{[18](P116)}。数字移动媒介时代，智能技术加持下，地方复现的切入手段是嵌入，即人与遗址、人与智能设备、智能设备与遗址的三方互嵌。“人-遗址-机”中的“人”既可以是到访者，也可以是遗址区域的居民或管理者；“遗址”既包括探测的景观遗存，也包括历史建筑；“机”则包含嵌入遗址的数字化设备，与人“具身”的手机、手表等移动智能设备。

就南宋皇城遗址而言，在遗址勘探、开发确定的建筑或景观遗存点，埋设数字化设备于相应物体内，该物理空间的这些嵌入式且具有一定智慧功能的数字设备与到访者或居住者、管理者携带的移动智能终端形成在线网络，在“人-遗址-机”互嵌网络中，遗址物理空间的遗产信息与进入这个空间的人自身生产的信息实现“对流”和“共享”，人与智能设备生产的“在地”信息借助5G技术再传向数据平台；比如2016年，作为浙江省首批特色小镇文化建设示范点的南宋皇城小镇以“皇家文化板块”“南宋风情板块”“古都商业板块”“宋学经典板块”“宫廷养生板块”等五大板块的南宋风情呈现和体验为由头，虽然打的是旅游休闲产业牌，却在皇城遗产保护和文化创意产业之间嵌入数字媒介，融科技、休闲、智慧于一体，对南宋皇城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化借助微博、微信、短视频等共享平台，使作为“中间体”的遗址和皇城文化在与移动数字设备互嵌中，通过信息生产与传播的组织逻辑和记忆方式，形成新的记忆媒介。

（二）技术逻辑：沉浸与交互

“人-遗址-机”互嵌作为地方复现的切入手段，其技术依托是沉浸传播，其具体路径则是交互体验，沉浸性和交互性的达成是地方复现的技术逻辑。沉浸传播（Immersive Communication）“是以人为中心、以连接了所有媒介形态的人类大环境为媒介而实现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传播。它是使一个人完全专注的、也完全专注于个人的动态定制的传播过程。它所实现的理想传播效果是让人看不到、摸不到、觉不到的超越时空的泛在体验”^{[19](P43)}。一般来讲，沉浸传播所依托的技术主要是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VR）和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AR），有时也会借助于拓展现实（Extended Reality, XR）；沉浸传播的基本特征是“沉浸”与“临场”。

作为皇城文明传承的“中间体”媒介，南宋皇城遗址因为绝大部分资源埋藏于地下，其可见性主要体现在宋画中的宫阙建筑、人物服饰、祭祀庆典等场景；因此其可见性的复制需要依托最新的图像生成与传播科技，数字技术为沉浸式展示南宋皇城文化提供了契机，360度全场景拍摄、全息投影、虚拟成像等技术可以将宋画或史书中南宋皇城的标志性宫阙殿宇、皇家园林，以及相关人物、事件过程全方位复制；在“人-遗址-机”互嵌完成后，储存在遗址特定物理空间或遗存点的事物、事件及文化仪式等，随着手机等智能设备的引导与到访者身体的移动，通过嵌入智能设备的AR/VR/XR等沉浸技术，产生多元化的视知觉传播效果和感知体验，把人“代入”新场景，产生临场感，从而在遗址物理空间与历史场景实现“破界”融合。与圆明园、敦煌、故宫的虚拟数字还原不同，南宋皇城遗址“人-遗址-机”互嵌下的沉浸与互动是在真实的“历史”场景中交互实现

的，其物质属性鲜明，非单纯的数字虚拟所能比拟。因此，虚拟的南宋皇城呈现与遗址物理空间内身体参与的沉浸、交互体验融合是实现皇城遗址保护、复现地方及文旅发展的重要在地性策略。

（三）传播指向：即时性与历史性同一

网络社会“时空压缩”下，人们漂泊于“无根”之旅，生发出回望历史、回归地方的深沉情感，以本土的身体经验和历史情感对抗“网络化、非历史性的流动空间”^{[20](P524)}。地方复现的在地性，最终体现在地方的历史性呈现。但数字传播、人工智能、5G等技术带来的“漂泊无依”感却在媒介的“非物质化”趋向下，愈发即时化、瞬间化。因此，实现数字移动媒介线上空间的即时性与遗址物理空间历史性对话，是城市遗产保护和地方复现的关键所在。

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向和德布雷的“中间体”媒介观，为这种对话的实现可能提供了依据：移动数字媒介因浓重的“具身性”，使其信息组织和生产在依附于人身体参与的同时，同样依附在其所经验的地理空间，依据地理空间的物质逻辑组织并传播信息，因此其所在地理空间的文化仪式、地方精神等象征性意义集合体以及历史建筑、遗址景观等物理载体皆因“人-遗址-机”互嵌，和沉浸-交互体验的达成而与城市遗产背后的历史深度、族群价值产生关联，数字移动媒介也就成为传承文明的“中间体”而获得历史性。因为南宋皇城遗址埋藏于地下，目前关于南宋皇城遗址公园建设的论证中，多倾向有机串联地表尚存的南宋官窑遗址、太庙遗址、严官巷南宋遗址以及八卦田遗址等，并融入中山南路、十五奎巷市井风情复现，以历史空间和当下空间相结合，在数字媒介加持下，展现公众身体参与及互动体验，在数字网络空间与地理空间交织而成的“混合空间”感知中，获得即时性与历史性同一的媒介体验；移动数字媒介也以线上传播即时性与遗产场景历史性的对话，形成补充、延续、传承地方文明与城市遗产生命、精神及认同的力量，帮助复现并维护一个区别于“他者”的地方。

五、结语与讨论

城市遗产保护中的地方复现并不是简单的“回头看”。因为“从本质上说，城市原是一个纪念性仪典中心，是由宫殿、庙宇、圣祠构成的复合体”^{[21](P81)}。简单的复建或还原就如同“集体记忆被放置在一些用同一个名字命名的‘地方’，那么记忆的这种集体性很快就会患记忆遗失症”^{[7](P9)}。因此，真正地传承和保护应建立物化的组织体系与互动的制度，它“是一种动态的文化保护，涵盖对物质空间和社会生活的保护”^{[22](P194)}。在审美基础上，依据道德意识和自豪感^{[1](P162)}复现反映历史本质的地方才是长远的，才是一种“相互联系、具有认同感的结构”^{[7](P13)}。南宋皇城遗址未来的开发与复现无论是博物馆式，还是遗址公园式，都应做好价值重估，以空间“在地性”、传播“在线性”和时间“历史性”为路向，使遗址开发不仅成为一个物理空间，更能真正作为传承文明的“中间体”媒介，复现杭州乃至江南的独特“地方”，既回应现代人在全球化、城市化浪潮中对安定与归属的盼望，又为当前城市遗产保护中文明传承提供现代与过往的联系；同时通过城市遗产媒介化，推动地方文明及遗产传承的持续创新。

德布雷媒介学理论至少在两个层面上，为当下地方复现和城市遗产保护提供了思路，一是在媒介的空间传播之外，突出时间传承的向度；二是突出文明传承的“物质属性”与物质化制度组织。德布雷通过对媒介与文明的勾连，把媒介作为“中间体”的物质属性揭示出来，为考察当下数字移动时代城市遗产保护及文旅发展提供了新视角。而数字移动媒介在城市遗产保护中对地方文明的“侵入式”呈现与建构，也延伸了德布雷的“媒介圈”理论。

参考文献

[1] [美]段义孚. 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M]. 王志标,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 [2] [英]迈克·克朗. 文化地理学[M]. 杨淑华, 宋慧敏,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3] 邵培仁, 杨丽萍. 媒介地理学: 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0.
- [4] 汪黎黎. 当代中国电影的上海热象(1990—2013): 一种基于媒介地理学的考察[D]. 南京: 南京大学, 2015.
- [5] 吕清远. 作为经验的传播: 传播学研究物质性转向的逻辑进路与范式转换——在二元对立的传播观念当中寻找一条中间路径[J]. 新闻界, 2019(8).
- [6] 黄显. 作为纪念物的数字移动媒介: 德布雷视野下的媒介与遗产传承[J]. 新闻界, 2020(3).
- [7] [法]雷吉斯·德布雷. 媒介学引论[M]. 刘文玲, 译; 陈卫星, 审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4.
- [8] 陈卫星. 传播与媒介域: 另一种历史阐释[J]. 全球传播学刊, 2015(3).
- [9] [法]雷吉斯·德布雷. 媒介学宣言[M]. 黄春柳,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10] [法]雷吉斯·德布雷. 普通媒介学教程[M]. 陈卫星, 王杨,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 [11] 何忠礼. 浅谈南宋皇城遗址的保护与利用[J]. 杭州研究, 2015(2).
- [12] 王晓. 文化景观视角下杭州南宋皇城遗址保护问题研究[J]. 中国名城, 2018(3).
- [13]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第二卷)[M]. 吴琼, 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06.
- [14]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M]. 何道宽,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 [15] 傅伯星. 巍巍皇城[M].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17.
- [16] 何琼华. 从城市设计角度看南宋临安城遗址保护[J]. 杭州文博, 2019(5).
- [17] 邵培仁, 等. 媒介理论前沿[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 [18] [韩]康在镐. 本雅明论媒介[M]. 孙一洲, 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9.
- [19] 李沁. 沉浸传播——第三媒介时代的传播范式[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 [20] [美]纽曼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夏铸九, 王志弘, 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21] [美]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M]. 宋俊岭, 宋一然,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8.
- [22] 阮仪三, 李红艳. 真伪之问: 何谓真正的城市遗产保护[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6.

Imperial Palace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as an Intermediate: Local Reproduction and Heritage Inheritance in the Field of Media Science

DONG Wei-min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space-time compression, local reappearance represents modern people's yearning for stability and security and resistance to uncertainty. Urban heritage,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urban space, maintains a stable regional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city local confirmation, urban heritage has the clear "boundary" significance. Media geography emphasizes the deep-rooted "local" of media, while Debray's media thought highlights 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media carrying "intermediary behavior" of "intermediate", and constru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ivilization in different times, participates in the material attribute of "local" shaping.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edia geography and the related expression of Debrae's media though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Media attributes as "intermediate" in Imperial Palace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visibility of the city heritage, and the digital mobile communication turn in the local reappearance and heritage inheritance. The stud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media exte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heritage communication and local identity in the new technology era.

Key words: urban heritage; local; intermediates; visibility; digital media

(责任编辑 周振新)